

田野关系是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工具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他文化学者之间、他文化学者与本地学者之间、学者与被调查民众之间关系的组合和合作, 构成了田野关系。田野关系既是理论, 也是方法。它被用来搜集、描述和解释民俗志资料, 它规定了学者把自己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个民俗文化网中的行为模式。田野关系使田野工作变为田野研究, 而不只是搜集资料。

【关键词】 田野关系; 华北; 民间用水的文化习惯

【中图分类号】 K89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1) 05-0051-04

近年我和同行在华北农村做了一些当地用水文化习惯的调查, 调查中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建立田野关系, 或者可以简单一点说, 田野就是关系, 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资料, 就有什么研究结果。

在田野调查点存在着三种关系, 即他文化学者的关系、他文化学者与本地学者的关系, 以及学者与被调查民众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组合与合作, 就构成了田野关系。

田野关系被用来搜集、描述和解释民俗志资料, 尤其是被用来发现和阐释书面文献所不记载的口头资料, 这一过程又被简称为“田野”。实际上, 在我们这个书面文献和口头资料都很丰富的文化大国里, 文献与田野相辅相成, 可以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生活的角度, 反映研究对象的民俗史、民俗活动模式和民俗文化的变迁。

田野关系规定了学者把自己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个民俗文化网中的行为模式, 并自愿地遵守这个模式。它能促成学者与对象社会的各层次文化相接触。学者可以根据对象社会的文化反应, 选择出其中大量重复的部分, 将其划定为民俗, 然后确定其类型, 再寻找出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在田野中, 学者要在一些核心问题的认识上取得共识, 直至发现对象文化中的结构模式, 产生了不同于前田野的自身想象的新认识, 然后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上, 发展自己的思路, 撰写调查报告和研究著述。

我和我的同行通过建立田野关系, 走进了华北的民间水文化, 也逐步构建了阐释这种水文化的理论框架。

一、建立田野关系的要点与阐释研究对象的基本文化单位

调查民间用水文化习惯的田野工作, 涉及技术含量较高的水利史, 接触到中国人十分敏

【收稿日期】 2001-02-23

【作者简介】 董晓萍 (1950 -), 女, 辽宁大连人, 文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感的社会关系，还要从水土资源国有化与地方村社水土管理民俗化的矛盾与调适的历史事实出发，发现其文化脉络，因此田野关系比较复杂。我们组成了由上述多元层面构成的田野关系，包括以国际学者和本国高校学者为成员的他文化学者、以地方学者和地方农业水利技术人员为成员的本地学者、以民间社首与用水村民为成员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适应了用水民俗调查的课题需要。这种田野关系区别于以往的地方，主要是在学者的概念中加进了一个本地学者的层面，将其作为他文化学者认识地方民间社会的媒介，这样就把原来的一个“学者”层面，划分为两层，再加上当地民众，一共是三层。建立田野关系以后，可以调动三个层次的互动，观察的效果就比较客观。这样就改变了从前使用的学者与民众二元式调查法，而代之以多角色的现场转换。在调查现场，每一个他文化学者都既是调查者，也是被调查者；每一个地方文化成员既是被调查者，也是某种情况下的调查者。大家分别找到了要向文本和田野学习的东西，都发现了别人文化存在的价值，彼此愉快地合作，直至从物质化的水问题中找到它的人文之根。

比如，按照从前田野调查的“局外”学者的观点，国际学者在华北民间水文化的研究上，应该最少发言权。但实际上，他们较早地注意到了散落在华北乡村的村碑水册，中国学者是受到了他们的启发的。同理，按照从前的“局外人”的观点，华北本地学者在提供他们撰写的水文化著述方面，也都应该是内行，结果却不然。我们发现，在这些撰写本地地方志（其中包括《水利志》部分）的人员中，没有去过书中提到的地方的人，还不止一二位。这种“视”而不“熟”的现象，在建立田野关系前是见怪不怪的，但有了田野关系，大家能从新的视角，共同调查民间用水的历史经验。

田野关系引导我们发现，华北民间用水文化的基本单位是水源样式、村碑水册和社会组织。

我们这次做田野调查，重点解剖了华北农村的两个点，一个在陕西，一个在山西。我们通过工作感到，在研究民间社会的用水文化习惯上，搜集村碑水册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寻找村社组织，他们是保存、使用和解释村碑水册和维护节水习惯法的关键人物，没有他们和他们组织的民俗活动，村碑水册就成了书法字帖。水源样式是相对次要的，它的多寡，实际上因人为因素在被扩大或缩小，例如山西的一个调查点——四社五村，一千多年前就严重缺水，但因为民间形成了严格的节约用水的民俗制度，却奇迹般地生存了两万多口人。

田野关系也是他文化学者、本地学者和民众三方在日常状态中的关系交叉，在经过田野工作后，它能逐步地导致地方水管理的层级关系与学者理论的逻辑关系的内在统一。大约在下乡两年后，我们发现，在华北县以下的民间用水文化传统中，有县衙署、县水利官员和村社组织三级管理制。在正常状态下，县衙署和水利官员对村社用水管理松散，村社可以自治用水。只有在发生水利纠纷的时候，三个层级的联系才会表现出来。届时经水利官员与乡耆首老协调、县衙署立碑结案，村社组织便遵循碑文合约按章用水。民间赖合约分水，依靠严格的“水”际关系谋生。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多层级的概念关系，这就有可能从整体上描述当地传统用水文化的系统，逐步探索出当地的水源地、村碑水册和村社组织三者的逻辑关系。例如，根据山西四社五村缺水点的水利技术人员提供，当地的山林地带有一

法国历史学家 Christian Lamouroux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就撰写了关于华北村碑的文章。参见拙文《村碑民俗中的用水文化——兼谈文字与民俗的‘互联网’》，原载《中国教育报》2000 年 9 月 19 日第 7 版。

种特殊的水资源——地形雨。地形雨能在四社五村的上游形成峪流泉，因此这里的村社组织才能常年带领村民搜集地表水，并利用村碑水册，实行常年用水自治。但是地形雨的事，四社五村的村民说不上来。水利技术人员还证实，这一带山林的地形雨还养育了其他十二个峪的吃水农民，但那里是否也有类似四社五村的组织，水利技术人员就不知道了。后来我们从当地古衙署的水利案碑上，找到了明代其他村社轮流吃水的证词，发现了当地曾经普遍存在村社管水组织。不过坚持下来的，只有四社五村，这就不是水的恩惠，而是人的智慧和民俗的力量了。这个水源地、村碑水册和村社组织相联系的例子，单纯靠他文化学者与民众的对话是找不到的，单纯靠他文化学者与地方学者的合作也不行，它是三方合作的结果。

二、在田野关系中确立阐释村碑水册的理论原则

在中国，所谓田野关系，也是一种综合使用书面文献与口头资料的理论原则。调查点的一部分碑文水册，是由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保管的书面文献，孤立地看，它们是死的。据我们调查，老百姓不看碑，连水册也很少看。但村碑水册却是他们与水相依的历史遗产，是保证村社管水组织从历史上传承到现代社会的生死牌。我们得到这一认识，也依靠了田野关系。山西四社五村水册的真实含义，正是通过在田野中搜集口头资料发现的，这时只靠书面记录就读不懂，也不可能知道它怎样经村社组织之手世代相传。然而，当我们要确定这些口头资料的被认同程度、影响范围和发生作用的大体历史阶段时，还要参照书面文献。借助书面文献，才能比较口头和书面资料的描述方式和叙事态度，最后确定哪些是可利用的学术资料。如陕西点的村社节约用水的习惯法资料，就是经过阅读书面文献查实的，它使我们认识到华北水资源短缺地区民间用水的一般规律。

通过田野关系，在对村碑水册的阐释上，我们获得了如下初步认识：首先，村碑水册是县以下乡村社会官民合作管理水资源的标志；其次，民间运用村碑水册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行为含义中，而不是它的文字，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恢复地方社会管理水资源的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再次，由于华北水资源的匮乏，引起了地方社会对水概念、村概念、社概念的独特理解，这些地方性的知识理解和地方群体实践，构成了当地的民俗文化模式，影响了当地人建设地方社会的人文格局，包括建房修路、用水习惯、物质贸易、婚丧嫁娶、迎宾待客和宗教信仰等。

三、在田野关系中确立阐释村社组织的研究方法

田野关系，还能使学者注意在对象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民间的用水机制的运行方式。例如：它通过哪些民俗活动体现出来？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出现民俗社会和官方社会合作利用水资源的机会？民间村社组织是如何在这种社会系统中发挥权威作用的？等等。了解到这些，才能比较深入地阐释华北民间管理的的地方社会史。就我的研究看，其运作的民俗活动模式有三种：

一是争渠首。民俗活动有社火、祭龙王、庙会和崇拜渠首部分的其他水利标志物等。

二是争渠道。当地民间按渠段的空间，划分村民自治管水的单元小社会，称斗门。一个斗门的渠水所流经的地亩，为一个跨自然村和行政村的管水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形成渠长、斗长和行水员的组织网络和一套用水习惯法。在灾年来临之际，也能形成民间社会与官方社会的合作。

三是争水期。民俗活动为以月份为期，实行村社组织内部轮流吃水制度，以及流行陪房水、借水等习俗。享用这些习俗的村民，被视为“一家人”。他们互相认为是一条母亲河的女儿，彼此亲密地相处。

我们在研究当地的村社组织时，从这三种民俗活动入手，与社首和村民建立了良好的田野关系，发现无论在哪一种民俗活动中，村社组织都是民俗传承的灵魂。在他们的世代努力下，当地群众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水资源环境，禁止滥开水源的行为，使本地的赤字水源得到了延续利用。

总之，田野关系既是理论，也是方法。田野关系使田野工作变为田野研究，而不只是搜集资料。

Field Relation as Theory and Method

DONG Xiao-ping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Field rel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express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non-local scholars, between non-local and local scholars, and between investigators and the people being investigated. "Field relation" is both a theory and a method. It is used for collecting, 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folk materials. It stipulates the behaviour pattern of scholars in the folk culture of the objects of their research. It made "field work" to be "field research" instead of only collecting materials.

[Key words] field relation; North China; the cultural custom of people's use of water

[责任编辑 娜木罕]

书 讯

大型丛书《中国民族风俗志全书》将于年底出版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习俗。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邀集我国知名专家学者编撰，隆重推出大型丛书《中国民族风俗志全书》。本书将着重介绍我国56个民族的生产、交通、服饰、饮食、居住、婚姻、家庭、村落、岁时、节日、丧葬、宗教、道德、礼仪、口头文学等风俗民情。丛书每个民族一册，共分56册，为迄今为止我国首部最为全面汇集各民族风俗的大型文库。

本丛书初定今年年底出版。我们衷心希望得到民俗学、民族学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使这套丛书真正成为我国各民族民俗遗产的荟萃。

[小 满]